商丘日报
2016年12月
9日
星期五
新闻搭台 文化唱戏
文化周刊
总第332期
5版

文化天地

“丝路上的锦绣襄邑”系列之一：

汉代丝织中心中原襄邑

□ 马学庆 黄业波

引子 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点，自汉代丝路开辟后，全国的丝织品汇集于此，由此踏上西域之路。

当时，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即是全国两大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中心之一，“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左思的《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的语句，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赞美。《汉书》、《二十五史补编》中说，襄邑能织锦，妇无不巧。

“锦”，在东汉语言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锦，襄邑织文。朱骏声按，染丝织成文章也。汉襄邑县贡织文。”织绣纹样在古代统称“织文”，省称“文”。织文是一种织着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康熙字典》解释为：“锦，《说文》襄色织文也。从帛金声。《徐曰》襄，杂色也。汉魏郡有县，能织锦绮，因名襄邑。”由一地名产而成为文字特定释文称谓，可见襄邑织锦的影响力在当时堪称首位。

一 马王堆汉墓中的素纱禅衣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缭绫》中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霜。”咏吟这诗句，以为诗中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缭绫的描写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至闻名于世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墓中大量丝织品，特别是两件素纱禅衣的出土，证实了诗人的描写并非凭想象夸张而作，而是据实形象化的描写。

1972年冬，在震惊世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件稀世珍宝——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素纱禅衣。当时它们压在几十件衣物中间，异常轻薄，很难揭取，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当衣物完整地揭取出来时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通过称重，一件衣服长128厘米，袖筒长190厘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市两；另一块纱料，幅宽49厘米，长45厘米，重仅2.8克，可谓薄如蝉翼，巧夺天工，其纺织技术代表了汉代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素纱禅衣的尺寸非常宽大，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长达190厘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据专家估算，即使用复印纸，做一件同样大小的衣服，重量也要超过100克。素纱禅衣轻薄而透明，如何穿着呢？《诗经·郑风·丰》：“衣锦衣，裳锦裳。”多数学者认为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欲露华丽外衣纹饰，因此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禅衣，使锦衣纹饰若隐若现，增强了衣饰的层次感，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

后来，国内丝织专家花了整整20年时间，才复制成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为复制宝衣，不仅找到了当年制此衣所用的蚕种——三眠蚕，还为此生产了和西汉时期一样的绿色饲料。此过程耗时耗力，但尽管如此，复制品的重量仍比原品重了0.5克。

菱花织毛锦，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内棺外面的装饰。菱花贴毛锦的加工方法，可能是将绢砑光，上浆处理后，再用红黑等不同颜色绘出菱形图案作地，然后分别顺贴桔红、青黑二色羽毛，两色羽毛之间贴绢条，使其有明显分界。每片中央和两侧的柿蒂形花饰，则用贴有菱毛的一定形状的绢片附加上去。这种贴毛锦，就目前所见是最早的遗物，它反映出汉代织锦装饰方法的丰富多样和织工丰富的创造力。

考古专家通过对素纱禅衣上的“襄邑”字样分析，认证该衣和织锦均产自襄邑（今河南睢县），充分印证了当时襄邑丝织品出产之丰富和襄邑人丝织品技术的高超。

二 襄邑设“服官”为两汉丝织中心

西汉时期，就当时全国而言，除了齐鲁地区丝织品生产最发达外，“第二个盛产丝织品的地区是陈留、河南、河内三郡”（孙毓堂《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构成了当时中原繁荣、鼎盛的蚕桑丝织和纺织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丝织、纺织业中心。

两汉时期，陈留郡襄邑县是河南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的中心，这里盛产优质丝织品。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服官，指专门掌管为皇室制作高级丝织服物的一种工官，主管有长及丞，西汉时只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两县设置。临淄主要产品为皇室冬、夏、春（秋）三季的丝织服装纨縠，所以临淄服官又称三服官；襄邑主要产品为皇帝、贵族和大臣们穿的锦缎礼服，两者都属于国营纺织业。在襄邑“服官”作坊中做工的有数千人，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和女工。宋代曾巩《进奉熙宁八年同天节银绢状》：“敢荐服官，用参庭实。”

当时，襄邑县以出“文绣”著称，尤以锦为甚。文绣是指刺绣异彩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国语·齐语》：“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从，六妃九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汉书·文帝纪》：“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锦，本特指汉代河南襄邑所产之美帛，后泛指五彩绘织品。《说文·帛辞》：“锦，襄邑织文也。”段注：“汉《地理志·郡国志》，陈留郡属县有襄邑，今河南归德府睢州治，即故县地。《地理志》云：‘县有服官’。司马彪《舆服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可见，锦，初为襄邑之特贡，并曾设“服官”以职其事。

襄邑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两处国营纺织业基地之一，受到特别扶持，发展迅速。西汉末期，襄邑已使用提花织机，织成的制作礼服用的锦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师，以满足宫廷和贵族的需要。

两汉时期，襄邑民间织造锦绣之风很旺盛。王充曾说：“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王充《论衡》卷十二《程材》）。以至“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衣”（《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由此可见，襄邑生产的锦绣常贡献朝廷，作为皇帝、王公、将帅的服装用料。

至宋代，襄邑县的纺织品依然很出名。“厥篚织文，出于襄邑，池濯锦以为名。”至明清，睢州仍然是桑蚕养殖较集中的地区，民营丝织业兴盛，丝织品工艺精巧。明清之间，睢州以下设置四个大乡，其名分别为：锦绣、锦襄、锦翠、锦衣。清代后期至民国，随着棉织品的兴盛、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战乱频仍，襄邑丝织业逐渐衰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睢县官方的绸缎织造彻底停办。解放前，在睢县及周边地区匡桑树还处处可见，几乎家家养蚕，缫丝技术仍然保存，但织绸民间已基本不多见。民间养蚕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其茧大都由南方来的客商收购。

三 濯锦池中洗染“先染后织”

至今，睢县仍有汉代进行丝织制作的濯锦池遗迹。睢县史志办主任余宏献说，汉魏时期，襄邑的纺织手工业者沿池集中居住，长达一里余，大家都在池中濯锦。直到唐代，这里的纺织业兴盛了一千余年还久盛不衰。

据清光绪十八年《睢州志》：“濯锦池，盖邑之善织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明代睢州人刘淮《锦襄书院记》：“驼岗旁坡数亩为锦襄书院。锦襄者，旧襄邑学宫后，有濯锦池，故名。”由此可见，濯锦池在驼岗附近。

濯锦池，就是洗涤色泽鲜艳的丝织品的水池。有丝织，必有染练。俗话说：“春练丝帛夏秋染。”古代制丝流程为摘桑、喂蚕、上簇、缫丝、牵经、染色。将蚕丝染成各种颜色主要使用各种染草，染草中采用最广的是蓝。染丝的方法也很讲究，为了染成各种颜色，有一染，再染，甚至六染、七染的。《考工记》言染法：“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緇。”三次入染可成纁（浅绛色），五次入染可成緅（赤黑色），七次入染可成緇（黑色）。人们往往把丝染成各种颜色后，织成有文采的补帛。染色风干后的彩丝，要经过洗涤去杂方能进行丝织。濯锦池就是专门为此而建。

濯锦池原位于睢州古城内西北角，后因黄河泛滥，古城被洪水淹没，城址南迁，如今濯锦池所在区域已是一片湖水，位于湖内西北，但原址处仍为一池，水很清澈，用以种藕养鱼。每当荷花开时，濯锦池遗址处一池香袭，成为睢县北湖世纪公园内的盛景之一。仿佛古代的织女们仍在那里洗涤丝锦，天空中回荡着她们劳作中的笑语欢声。

笔者行走在濯锦池畔，听着睢县史志办主任余宏献有关襄邑织锦历史的讲述，眼前仿佛又重现当年这里万人织锦的盛况。毕竟，这里不仅曾是汉代专门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们的衣裳、五佩、备章、郊庙御服等丝织品的作坊，也是为“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送货源的中原最大的全国丝织品中心，两千余年的丝织文化积淀已浓浓地融入睢县血脉之中。

12月7日，商丘日报社调研组深入到夏邑县火店镇文化产业园，就该镇宫灯、旗穗、网穗、中国结等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现状，带动就业，助推扶贫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研。近年来，该镇从事文化产业人员突破1.5万人，其中贫困户3000人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近日，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商丘市四平调研究中心携大型现代戏《恩怨亲家》在宁陵县葛天大剧院倾情演出，使2000余名观众在演员诙谐的表演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高云光 摄

WENHUA ZHOUKAN

文化时讯

民权：让职工文化“嗨”起来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彦林 冯涛）“要不是县总工会组织全县职工诗词大赛，我也没有写诗词的兴趣，更没有想过成为商丘市诗词协会会员。”12月8日，民权县林业局退休干部徐留德拿出自己新近收到的商丘市诗词协会会员证兴奋地对记者说。

徐留德具有写诗的潜质，今年五一前夕，县总工会与县文联联合组织“迎五一”诗词大赛，激发了他写诗的兴趣，他以一首《环卫工》获得二等奖。8月，在2016年冷谷红情缘相约七夕诗词楹联比赛中，他又以一首《七夕相约冷谷红》诗获得二等奖。写诗不仅给他带来了快乐，也给他带来了荣誉，最近，他相继被市、县两级吸纳为诗词协会会员。徐留德的故事只是该县职工文化建设的一个实例。近年来，民权县总工会为了给全县广大职工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始终坚持以职工文化体育阵地为依托，充分调动职工文体骨干和广大爱好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推进各项职工文体活动，逐步形成了一批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职工文体活动品牌。全县各级工会组织月月有活动，年年有赛事，象棋、乒乓球、篮球、羽毛球、赛诗会、歌咏会等赛事连连，丰富多彩。今年9月，由民权县总工会主办的全县200多名县、科级干部参加的健康民权——“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徒步越野活动，更是把职工健康文化做到了极致。此项活动锤炼了团队精神，锻炼了个人意志，既感受了家乡的美丽，又体验了健身的激情，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创新的活力。目前，民权干部职工精彩文体故事正在如火如荼地演绎着。

吴忠献、卢彦林、尚中兴被批准为中国民协会员

本报讯 （季哲）近日，记者从民权县文联获悉，民权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忠献、民权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卢彦林、民权县民协主席尚中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展为会员。

据悉，吴忠献、卢彦林、尚中兴同志皆为中国庄子文化研究中心主要成员，多年来，他们深入挖掘民间文化，坚持民间文艺创作，在抢救和保护家乡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庄子文化研究方面成效显著，先后编辑出版了《庄子文化研究》第一、第二、第三辑，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传播庄子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孔子适宋

□ 刘秀森

司马迁《史记》载：“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郑。”

这段记载说的是，宋景公的时候，桓魋任宋国司马，南征北战，颇有功劳。桓魋后来有了篡国的野心。当时，孔子在鲁国不得志，去了卫国；在卫国得不到任用，又一次受了污辱，便离开卫国到宋国来。宋景公想让孔子来宋国，因为孔子有超人的治国谋略，且手下有众多文武全才的弟子，宋景公想任用孔子以强国。而司马桓魋却担心孔子带领他的弟子来了会夺了他的位置，便想杀孔子。桓魋对宋景公说：“我主莫非欲将宋国江山拱手让与孔丘乎？”宋景公问他何出此言，他说：“孔丘在鲁，父母之邦，官为大司寇，兼摄相事，位极人臣，然而却要辞官出走，可见其野心非小。他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对他敬而不用，可见卫看透了他。宋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如今孔丘师徒不请而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宋景公说：“人家是当今的圣人，哪会做出那样犯上作乱之事？眼下宋国正在用人之际，有他们这一班文武干才，岂不可以对外征战，对内安邦定国？”桓魋说：“我主若收纳孔子师徒，委以重任，他们一旦发起难来，谁能抵御？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这事就交给臣处理吧。”

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到宋国后，住到一个旅店里，等待宋景公召见。其间，孔子带领弟子一起在宋国都城东北的一棵大檀树下讲学习礼。桓魋听说后，悄悄带着一帮人马，火速出城。

事先，孔子的弟子、桓魋的弟弟司马牛请求孔子允许，进城去说服桓魋不要那么骄横。司马牛进城没有说服桓魋，见桓魋要向孔子下毒手，连忙让人代他去向孔子报信。孔子听说，立即停止习礼，带领弟子退到旅店。桓魋到了孔子讲学习礼的檀树下，却不见了孔子，后悔自己来得迟了，恨得朝檀树上砍了一刀，命人将檀树伐倒。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处境十分危险。子贡对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桓魋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咱们还是快逃吧。”孔子却从容镇静地说：“不要怕。天把人类的道德都集中在我身上了，我有这么大的道德使命，一个小小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子路说：“虽然如此，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走为上。”便与子贡等人一起将孔子拥上车，速速离开旅店，上了大道。旁边有人看着他们师徒狼狈的样子，不由得指着他们嗤嗤地笑着议论说：“你看孔老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

孔子师徒上了去郑国的大道。子贡往后看了看，没见桓魋的人马追来，便松了一口气。这时，孔子问子贡：“我们离开旅店时，我看见有个人指着我议论什么。他说什么来着？”子贡说：“他们说的是骂人的话，老师不问也罢。”孔子毫不在意，哈哈一笑说：“骂老师的话，怎么不可以告诉老师呢？他若是骂得对，不是对老师有好处吗？不必避讳，说来我听。”子贡这才告诉他说：“他说……他说……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

子贡以为孔子听了一定会不高兴，没想到孔子却惊叹一声，说：“呀！说得好啊！恰如其分，真是再好不过了！”子贡如坠五里雾中，惊异地问孔子：“夫子为何还这样说呢？”孔子感叹说：“‘惶惶如丧家之犬’，此言寓意太深奥了！他不是在骂老师，是对老师极高的赞美呀！”子贡等人匪夷所思。孔子向他们解释说：“你们想，我尽力报效鲁国，却为鲁国执政者所不容，只有长期游荡在外，到处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有人还要赶我走，甚至要杀我，我岂不像丧家之犬吗？……”说罢竟大笑起来。子贡和子路等人不禁在心中佩服夫子的胸怀宽大。

放弃崇高理想而委身丑陋现实的“丧家之犬”是可耻的；守护精神家园而拒绝与世偃仰的“丧家之犬”是值得赞佩的——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商丘故事
刘秀森专栏

编辑 戴文杰
E-mail:15539031801@163.com